

荔波县划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荔波县编制出台了《荔波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划定四大不同民族区域为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此推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和传承。

据了解,荔波县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主要居住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等22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民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其中“水书习俗”“瑶族猴鼓舞”“布依族侉戏”都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荔波县在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积极打造地域文化、生态文化,先后举办了民族服饰展演、民

间民歌赛、各民族节日庆典等,都取得圆满成功。

为改善文化遗产的保护环境,使濒危和重要的文化遗产以及一批传承人得到有效的保护,荔波县划定了瑶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水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布依族文化生态保护区4个保护范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切实做好传承人、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保护区管理体系及运行机制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增强区域内群众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和尊重,不断提高群众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陈荣)

《横沥咸水歌》出版

本报讯 由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民间组织整理的《渔声——横沥咸水歌》日前正式出版。该书分赞颂、婚嫁、劳作、生活、情歌对唱5个篇章,记录了横沥本地广为传唱的咸水歌经典曲目80余首,对咸水歌的历史渊源、历史价值以及它的各个发展时期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类和阐述,还对咸水歌民间歌手及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介绍。

据介绍,为了使咸水歌能很好地传承下去,近些年横沥镇有关部门采取了不少措施,如组织不定期的咸水歌比赛,鼓励民间艺人积极参加省内外的咸水歌交流演出活动,还将咸水歌纳入了中小学生的音乐课内容。(杨薇 南宣 杨焱)

大连市非遗展览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由辽宁省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大连市财政局、大连市教育局主办、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览进校园活动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心小学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历时一个半月,在市内四区的16所小学进行流动展览,参展项目包括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复州皮影戏、庄河剪纸,列入省级名录的马骊骥根艺、桃

核微雕技艺、普兰店传统木雕手工艺,以及列入市级名录的张宝栗雕刻、普兰店传统手布工艺制作技艺、大连木偶戏、金州胡氏石雕。

据介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览进校园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调动学生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兴趣,让他们近距离地接触、了解它,从而更好地将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曲丹丹 邢易)

十三代开油坊

黄陂农民建成老榨坊博物馆

本报讯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建设,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杨楼子老榨坊博物馆近日竣工,免费向公众开放。该博物馆由黄陂区农民杨德元投资建设,收藏有明清油榨、石碾、油缸、石雕等文物百余件。

博物馆占地面积近2000平方米,分为展示区、休息区、生产区等几个部分。展示区内陈列有明清古榨各一套,其中清代古榨专门用来向市民现场演示传统榨油的生产流程。展示区内还展出了与榨油有关的大批工具和容器,如碾槽、石磨、风斗、油缸等物品。

根据家谱记载,杨德元的祖辈在明洪武二年(1369年),从江西奉诏迁到黄陂县南乡温家岗杨家湾;明嘉靖年间,杨家开始从事榨油行业,开设了杨楼子榨坊,榨油技艺世代相传,传承至杨德元已是第十三代。如今,以杨氏榨坊为代表的黄陂榨油技艺已被列入湖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德元表示,他自小跟随父亲在榨坊从事榨油生意,不愿祖辈流传下来的榨油工艺消亡,就建了这个老榨坊博物馆以传承农耕文化。

(陈奇雄 刘文祥)

在传统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

——记凌源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于振声

曹 洋



于振声在制作皮影

传承之难

跟演出时用于操作的皮影不同,于振声雕刻的皮影基本属于“看影”,就是镶在镜框中供人观赏的皮影。作为突出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美术工艺品,“看影”的雕刻要比作为演出道

具的皮影更精细复杂,因此对艺人的雕刻技艺要求也更高。

于振声说,首先要讲究设计,强调“框子”(构图)布局合理,符合人物的特点。雕刻头茬尤其要注重神韵,“一身气在脸上,一脸气在眼上”,追求明亮之美和灵动之气。“三分雕刻,七分着色”,在着色前,要对着色的对象有整体构思,想象影人动起来的样子,这样才能把颜色上活。看似简单的钉缀,也要反复“掂对”(琢磨),钉完之后,把影人提起,叫它站立,必须“前不过挺、后不背锅”。

这种标准下的皮影雕刻绝对是一个费时费工的活儿,没个三五年出不了徒,所以愿意学习这门手艺的人少之又少。深知其中苦处的于振声决定把接班的重任交给自己的儿子于化臣,为此还费了一番工夫。2007年,于振声眼看自己年纪大了,就让自己在市自来水公司上班的儿子于化臣提前退休回家,专心学习皮影雕刻。于振声还有两个徒弟,但都有正式工

作,只能在闲暇之余帮帮忙。

于振声没有专门的雕刻作坊,只能将客厅兼做工作室,有客时会客,没人时刻影。处理驴皮的一系列工序会发出很浓的气味儿,于家住楼房,没有场院,没办法在家里做,于振声只能动员亲戚来做这个活儿,而且承诺不论成品、废品一律全包,这才解决了驴皮的问题。

市场“突围”

作为工艺品的皮影市场需求目前正在不断增大,皮影刻制的未来发展大有风生水起之势。但对于于家父子而言,想要完成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化生存还有一段路要走。

实际上,于家父子从未真正做过皮影“生意”,心思更多的是放在传承、钻研技艺上。于化臣说:“父亲和我都没什么经济头脑,刻了这么多年的影儿,从没主动卖过,都是人家上门来订。”他们既没打过广告,也没有开设专门的店铺销售,“振声影雕”在凌源的声望完全是靠“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尽管没有刻意宣传和营销,“振声影雕”也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求购者络绎不绝。但“没有经济头脑”的于家父子这些年刻制的皮影几乎都是连送带卖,有时朋友熟人来买,碍于面子,也就收个工料钱,因此并未从中获得多少经济效益。

由于人手不足,他们同样无



春节将至,江苏省句容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彩的传承人陈柏华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他告诉记者,应“2012苏台元宵灯会”主办方的邀请,句容陈氏秦淮灯彩将应邀再赴台湾展出。秦淮灯彩亦称“金陵灯彩”“南京灯彩”,是南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之一。秦淮灯彩汲取了中国传统纸扎、绘画、书法、剪纸、皮影、刺绣、雕塑等艺术之长,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发(沈鸣摄)

专家视角

面对城镇化浪潮,我们紧急出动

冯骥才

十多年来,我们走进田野,去发现和认定濒危的遗产,再把它整理好并加以保护;可是这样的抢救和保护的方式,现在开始变得不中用了——因为城镇化开始了。在这迅猛的、急切的、愈演愈烈的浪潮中,平房改造、村庄合并、土地置换,农民还徙到城镇,丢弃农具、卖掉牲畜、入住楼房,彻底告别农耕……那么,原先村落中那些历史记忆、生活习俗、种种民间文化呢?一定是随风而去,荡然无存。

这是数千年农耕文化从未遇过的一种“突然死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皮之毛,焉能久存?古村落如今只剩下一条存在的理由:可资旅游。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和文化财富留着,更少有人把它作为文化载体留着;只把它作为景点。我们的文化只有作为商业的景点、卖点才有生路,可悲!

不久前,我深入到晋中大行山深处,惊奇地发现那些身处

悬崖绝壁的一个个小山村,也正在被“腾笼换鸟”,改作赚钱的景区。这里的原住民都被想方设法搬迁到县城陌生的楼群里,谁去想那些山村是他们世代代建造的家园,里边还有他们的文化记忆、祖先崇拜与生活情感?然而即便如此,这种被改造为旅游景区的古村落,毕竟还有一种物质性的文化空壳留在那里。至于那些被城镇化扫却的村落,则是使城市失忆和千城一面。

城镇化与城市化是世界性潮流,大势所趋,谁能阻遏?但城镇化对于非遗来说,无疑是一种连根拔、一种连锅端。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急转弯,没有足够文化准备,身边极具遗产价值的民间文化甚至还没来得及被当做文化,就已濒危、瓦解、剧变,甚至成为社会转型与生活更迭的牺牲

品。对于我们,不论什么再好的东西,只要后边加一个“化”,就会成为一股风,并渐渐发展为飓风。如果官员们急功近利的政绩诉求和资本的狂想再参与进来,城镇化就会加速和变味,甚至进入非理性性。

此刻,在我的身边出现了非常典型的一例——杨柳青历史上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突然之间成了城镇化的目标。数月之内,这些画乡所有原住民都要搬出。生活了数百年的家园连同畴水洼,将被推得一马平川,昔时这一片“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神奇画乡,将永远不复存在。它失去的不仅是最后的文化生态,连记忆也将无处可寻。

我们刚刚结束了为期9年的中国木版年画的抢救、挖掘、整理和重点保护的工作,才要喘一口气,缓一口气,但转眼间它们再陷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得多,紧迫得多。十年前是濒危,这一次是覆灭。

我说过,积极的应对永远是当代文化人的行动姿态。我决定把它作为“个案”,作为城镇化带风。给民间文化遗产新一轮破坏的范例,进行档案化的记录。同时,重新使用15年前在天津老城和估衣街大举拆迁之前所采用的方式,即紧急抢救性的调查与存录。这一次还要加入多年来文化抢救积累的经验,动用“视觉人类学”和“口述史”的方法,对南乡三十六村两个重点对象——官庄子的红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进行最后一次文化打捞。我把这种抢救在它消失之前进行的针对性极强的文化抢救称之为“临终抢救”。我们迅速深入村庄,兵分三路:研究人员去做重点对象的口述挖掘;摄影人员用镜头寻找与收集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和重点保护的工作,才要喘一口气,缓一口气,但转眼间它们再陷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得多,紧迫得多。十年前是濒危,这一次是覆灭。

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我们已拥有一份关于天津市西青区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较为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有血有肉地填补了杨柳青画店史的空白;而在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官庄子村一份古代契约书上发现的能够见证该地画业明确的历史纪年,应是我们面对面扑来的城镇化浪潮第一次紧急的出动。这不是被动和无奈之举,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对于历史生命,如果你不能延续它,你一定要记录它。因为,历史是养育今天的文明之母。如果我们没了历史文明——我们是谁?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印象

诞生于齐鲁大地的五音戏有近300年的历史,曾广泛流行于山东中部的济南、淄博及周边地区,其唱腔婉转妩媚,多以家庭伦理道德和当地妇女的生活状态为主要题材,极易引起观众共鸣。2006年,五音戏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五音戏的发展历经了秧歌腔、周姑子戏、杂社、五音戏四个时期。“肘鼓子”是一种声腔系统,因演唱时肘悬小鼓拍击节奏而得名,是山东地区和苏北一带地方戏的总称。秧歌腔最早就属于“肘鼓子”,发展到后来,由于“周姑子”的加入,无论是腔调还是表演风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姑子”是当地方言对尼姑的称呼,关于“周姑子戏”的来源,行内有两个版本的传说。一说距今100多年前,在济南市章丘县文祖镇西田广村的尼姑庵内有一个尼姑姓周,经常口哼小曲四处化缘,她演唱的秧歌腔小曲委婉悲戚,让人怜惜,所以施舍丰厚。当时民生凋敝,乞讨者甚多,他们学唱周姑子小曲,打场子、赶庙会、忙红白事,并由原来的干口清唱,逐渐加上锣鼓,形成了周姑子戏的雏形。另外一种版本说这位周姓尼姑在外出化缘时学会了不少秧歌腔小调,哼唱的“尼姑思凡”小调被庵主发现,结果被逐出佛门,她不得不唱着曲儿乞讨谋生。她委婉柔美、韵味独特的唱腔很快广泛流传开来,久而久之渐成规模,便有了“周姑子戏”。

清光绪年间,青野村的艺人赵宝子(赵国清)学习并改革了“周姑子戏”,同村的靳成章和靳成花兄弟拜他为师。后来,靳氏兄弟把戏名定为“周姑子戏”。民国初年,周姑子戏在章丘及周边地区已声名远播。上世纪20年代,靳氏兄弟率领戏班赴济南大观园演出,引起轰动。梆子戏班主邓洪山喜欢上了周姑子戏,便与靳氏戏班合并,拜靳氏兄弟为师,就是后来的名角“鲜樱桃”。此时周姑子戏形成了较为独立完整的板腔体系,并借鉴了京剧、昆腔、梆子等剧种的伴奏、服装、道具、化妆,形成了专业演出社班,影响不断扩大。1935年10

月,经人介绍,邓洪山带领由两个“武场”和两个男演员组成的“五人班”,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将剧种名称最终确定为“五音戏”,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邓洪山、明鸣钧、刘方玉等人将3个五音戏班合并,建成第一个较大的五音戏演出团体,于1950年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登记落户,称“五音剧社”,1956年改名为“淄博市五音剧团”,邓洪山为第一任团长。

1969年1月,五音剧团受到“文革”的冲击而解散。1976年8月,以原有五音剧团人员为基础,淄博市五音剧团重新建立,1998年更名为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如同其他小剧种的发展状况一样,五音戏也面临很多困难。淄博市五音戏剧院因资金、演出市场等问题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民间的零星班社组织规模不大,水平参差不齐,多以演出传统剧目为主,没什么创新与发展。淄博市五音戏剧院院长孙强认为,五音戏的保护传承困难很大,“大演大赔、小演小赔、不演不赔,这直接导致剧院经费严重不足。每年春节期间近百场下乡演出几乎占到了全年演出场次的一半,而每场只有2500元至3000元的微薄戏酬,维持收支平衡都很困难,因此人才流失也很严重,演员队伍面临断档,创作人才更为稀缺,目前专职音乐创作人员只有副院长毕金奎一人。”五音戏的艺术研究也严重滞后,鲜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自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五音戏有了一些发展契机。五音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霍俊萍积极参与校园读本《走进五音戏》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大力培养年轻演员。省级传承人吕凤琴多次到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大学等十几所高校进行演出、讲座。此外,五音戏剧院也在不断编排新的剧目,并实现了资料的归类与管理,同时运用文字、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五音戏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记录。

『五音』也叫『周姑子』

韩菽筠